

高等教育中的新分析—产业综合体：数据、治理和权力

克里斯·R·格拉斯、杰拉尔多·布兰科

克里斯·R·格拉斯（Chris R. Glass）：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教育领导与高等教育系（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Higher Education）教授

电子邮箱：glassch@bc.edu

杰拉尔多·布兰科（Gerardo Blanco）：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副教授、学术主任

电子邮箱：blancoge@bc.edu

全球各地的大学正悄然将自主权拱手让给少数几家私人数据公司，这一趋势可能构成高等教育历史上最重大的权力转移之一。

在这场变革的前沿，是《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以下简称为 THE），该机构从一份教育类杂志，演变为大学排名机构，再到如今的数据提供商与咨询机构，其发展历程正好体现了新型“数据帝国”的崛起。THE 由欧洲私募股权公司 Inflexion 所拥有，目前掌握着来自 155 个国家、2,860 所院校的 472,694 条数据（2025 年排名）。然而，这庞大的数据资源仅是 THE 不断扩张版图的一个侧面。

THE 年营业收入达 9,570 万美元，拥有 315 名员工，并通过多项战略性收购在多个领域扩大其影响力。它最近收购了全球最大的教育部长会议“世界教育论坛”（Education World Forum），该论坛在 2023 年吸引了 120 位教育与技能部长参加。除此之外，THE 还收购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新闻平台 Inside Higher Ed 以及商学院资讯平台 Poets & Quants。通过这些战略举措，THE 已在新闻报道、数据分析、学生招生、商学教育情报以及部长级教育政策参与等领域实现了显著扩张。

这种权力的集中并非 THE 独有。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 以下简称 QS）近期收购 HolonIQ 的事件，标志着又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并——催生了一个服务于 6,950 家院校与企业客户的教育情报巨头。两家公司均实现了显著增长。合并后的机构在全球 15 个办事处拥有近 900 名员工，整合了 HolonIQ 的先进人工智能驱动分析平台，以及其包括苹果（Apple）、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等科技巨头，贝莱德（BlackRock）、高盛（Goldman Sachs）等金融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在内的高端客户群。

教育治理的私有化：从排名到监管权力

这些并购活动凸显出主要排名机构，如 THE、QS 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下简称 ARWU）如何突破其传统的大学排名职能，转型为复杂的数据分析企业，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并维护着庞大的高校数据资源库。

在高等教育领域，数据分析已从一种辅助性工具转变为推动高校战略的核心驱动力，标志着大学治理模式与传统学术治理之间出

现重大分野。各大学迅速引入了源自企业界的商业智能系统与信息仪表盘，而学习平台与学生档案的数字化进程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机构数据。

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涉及数据公司，也包括传统的咨询公司，形成了私营部门对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网络。麦肯锡（McKinsey）、德勤（Deloitte）、安永（EY）、毕马威（KPMG）和普华永道（PwC）等公司，正战略性地将自身定位为“教育未来的设计师”，不断发布关于“大学的未来”的重要报告与框架，越来越多地影响高校的战略规划。

根据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工会（National Tertiary Education Union）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澳大利亚大学管理机构的 545 个职位中，143 个由企业高管或顾问担任，其中约有 30 位顾问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

QS 近期还发布了一份题为《高校如何实现未来准备》（*How c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come future-ready?*）的报告。“为未来做好准备”似乎意味着依托 QS 的数据支持来指导高校的战略决策——从资源分配、学生支持服务到学术项目开发，无不以数据为依据。

这一从学术决策框架向商业决策框架的转变，引发了关于大学自主权和教育治理本质的深层次问题。

科技公司作为地缘政治参与者

这些新的大数据权力中介的崛起，也反映出地缘政治影响力更广泛且深刻的结构性转变——科技巨头正日益成为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今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中，这些数据巨头已崛起为“影子监管者”，其影响力往往超越传统国家或学术机构。

以 THE 近期收购“世界教育论坛”为例，这一战略举措使 THE 从单纯的数据分析提供者转变为连接各国政府与全球教育市场的重要中介。同样地，当 QS 旗下的 HolonIQ 同时为高校及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等科技巨头提供服务时，其角色已不仅仅是数据分析，而是在塑造高等教育与科技产业人才需求之间的接口。

这种权力的集中催生了所谓的“分析—产业综合体”（analytics-industrial complex）——一个自我强化的生态系统，其中，私人企业同时承担制定评估指标、控制营销平台、提供绩效分析、并参与政策讨论的多重角色。其影响力在各高校及国家对排名体系的反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QS 在 2024 年排名中将“学术声誉”指标权重从 30% 降至 20%，并引入新的就业指标后，各大学迅速成立了专门的“就业能力办公室”；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甚至通过“2030 愿景（Vision 2030）”等政策，将全球排名直接纳入国家战略中。

《自然》（Nature）期刊近期的一项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现象，显示国家层面的高教改革举措可使大学在 QS 和 ARWU 排名中平均上升 12.1 至 17.7 位。

这一趋势的深远影响在于：这些公司不仅在衡量教育质量，更在定义教育质量。这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循环——同样的机构既负责排名，又为大学提供战略咨询，并同时充当大学与潜在学生之间的媒介，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私人教育治理体系。

引导新的教育秩序

这种“双重转型”，即教育治理的私有化与科技公司作为地缘政治参与者，可能是当代最重大的权力再分配之一，它在“数字帝国”时代对学术自治提出了根本性挑战。数据

公司作为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正以超越传统国家边界的方式重塑全球权力格局。

“分析—产业综合体”实际上已在全球高等教育中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监管。当像 THE 这样的公司同时掌控排名体系、提供战略咨询，并召集教育部长会议时，它们形成了一个超越传统监管框架的自我强化影响圈。这标志着权力从公共治理向私人治理的深刻转移——商业机构日益在缺乏民主问责的情况下决定教育标准与优先事项。

此外，这些教育数据帝国的影响力已可与各国教育部相抗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 THE 能够同时召集 120 位教育部长，并掌控庞大的数据资源与分析能力时，它所行使的“软实力”已接近甚至超越传统国家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组织的影响。

更具关键意义的是，这一体系对学术自我治理的基本假设构成了挑战。大学如今处于一种不对称关系中——它们免费提供机构数据，却必须依赖昂贵的商业分析服务来解读和利用自己的信息。这引发了紧迫的问题：高校如何在新的权力结构下保持其作为知识创造与批判思维机构的本质？

这些相互交织的挑战揭示了全球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根本重组。商业数据企业如今已演变为超国家实体，其影响力超越了传统治理框架，却几乎不受民主监督。这场转变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数字帝国时代，大学的制度自主权与学术自我治理究竟该如何延续与捍卫。